

荆史纵横

荆州王家嘴筒《诗经》书写制度初探

□ 高中华

湖北荆州王家嘴798号战国楚墓竹筒《诗经》，是早期《诗经》文献的最新重要发现。该批竹筒总计约300支，内容涵盖传世本《诗经·国风》部分。《江汉考古》杂志2023年第2期刊出蒋鲁敏、尚玉军二位先生《湖北荆州王家嘴M798出土战国楚简〈诗经〉概述》(以下简称《概述》)一文，就竹筒形制及筒文内容作了初步介绍。其中有关竹筒书写制度的部分，对于认识《诗经》的成书及流传问题，具有重要意义。以下试从三个方面论述。

第一，篇末尾题。据《概述》，王家嘴筒《诗经》分篇书写，篇末有横贯筒面的方形墨块标识，且书有固定格式之尾题。如《燕燕》六言四章成篇，“《出其》六言三章成篇”，分别对应传世本《郑风·燕燕》与《郑风·出其东门》二篇。王家嘴筒《诗经》的尾题制度，与传世本《诗经》高度相似，而与已知其他出土战国《诗经》文献不同。

传世本《诗经》各篇篇末皆有尾题，注明全篇章数及各章句数。如《关雎》尾题“《关雎》五章，章四句，故言三章，一章章四句，二章章八句”。据陆德明《音义》，五章是郑玄所分，“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”。孔颖达《正义》据郑玄《六艺论》“未有若今传训章句”之说，认为“明为传训以来，始辨章句。或毛氏即题，或在其后，人未能审也”，指出章句的辨析出自毛公或其人。王家嘴筒《诗经》出现之前，已知文献皆与孔疏上述结论不相违背。2019年刊出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《诗经》，存诗57篇，诸篇之间以方形墨块为区隔，无篇末尾题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出阜阳汉简《诗经》篇末尾题格式为“篇名+字数”，如《邶风·七月》尾题“此右《七月》三百八十三字”(胡平生《阜阳汉简〈诗经〉简册形制及书写格式之蠡测》，见《阜阳汉简诗经研究》)，无章数句数之说明，仅统计字数。我们知道，篇末字数统计，他类文献亦不乏其例。武威汉简《仪礼》九篇，其中七篇篇末记有“凡若干字”之说明，如《士相见礼》尾题“凡千二百字”(陈梦家《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》，见《汉简缀述》)。马王堆帛书《易传·衷篇》尾题“衷二千”，廖名春先生认为乃字数之统计而有讹误者(《试论帛书〈衷〉的篇名和字数》，见《帛书〈周易〉论集》)。而同时统计章数及句数，则系《诗经》文献的特有制度。西汉熹平石经、敦煌《诗经》残卷等皆书尾题，注明章句，与传世本《诗经》格式相同。西汉海昏侯简《诗经》，尾题“(某篇)若干章章若干句凡若干句”，如“《既醉》八章章四句凡三十二句”(朱凤瀚《海昏侯竹书〈诗〉初探》，见《海昏侯简初论》)，与传世本小异而大同。诸种皆西汉以后文献。至于战国《诗

经》写本书篇末尾题，王家嘴筒《诗经》之前，乃绝无闻知者。王家嘴筒《诗经》的出现，表明今传《诗经》尾题形式的直接来源，至少可上溯至战国晚期早期。《孔疏》将章句的离析推定至毛公时代或其人，看来是不正确的。

第二，“篇”“章”“言”三级概念的使用。传世本《诗经》各篇分为篇、章、句三个基本单位，是《诗经》文本的基本概念框架与解说基础。由前引可知，这一制度至晚于王家嘴筒《诗经》时代已经确立，并以术语方式呈现。下面首先讨论“言”与“篇”。

前引王家嘴筒《诗经》“《燕燕》六言四章成篇”，“六言”，相当于传世本之“六句”。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在《关雎》篇尾题疏语中指出：“‘句’则古者谓之‘言’”。《论语》云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”则以“思无邪”一句为一言。《左氏》曰：“臣之业，在《扬之水》卒章之四言”，谓第四句“不告古人”也。及赵简子称子大叔“遇我以九言”，皆以一句为一言也。西汉时期依然沿用此概念。海昏侯简《诗经》“目录简”：“诗三百五篇 凡千七百六章 七百七十四言”，所谓“言”，即为“句”，与王家嘴筒《诗经》及孔疏所引诸例相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海昏侯简《诗经》正文部分又使用“句”这一概念，与目录简用“言”不同。如“《匪风》三章章四句凡十二句”。“言”“句”并用，或表明海昏侯简《诗经》源自多种文本传统。

“篇”作为《诗经》学术语，已见于传世文献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《诗》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。”其中“篇”的概念，与今天所使用者相同。其他出土《诗经》文献，阜阳汉简《诗经》S144“十二篇”(胡平生先生推定为《唐风》尾题)，海昏侯简《诗经》“三百五篇(篇)”，皆称“篇”，与传世本相同。安大简《诗经》于诸国风诗末尾统计篇数，然不书“篇”字，如“《周南》十一””。王家嘴筒《诗经》风末尾题尚未披露，然据篇末尾题可知，当时已使用“篇”这一概念，且其内涵与今所通行者一致。王家嘴筒《诗经》“篇”字的写法值得注意。该字上从竹，下半所从又见于郭店简《老子甲》简1，读为“绝弃弃辩”之“辩”。裘锡圭先生认为其字系“鞭”字古文，“鞭”“辩”声近义通。此字郭店简中多用为“辨”“辩”，又或相当于传世本之“偏”。(《郭店楚墓竹简》)王家嘴筒《诗经》“篇”字的写法，当有助于进一步梳理《诗经》相关概念的源流问题。

第三，章题与章次。王家嘴筒《诗经》章末有题记，注明章次。《概述》：“每一篇除第一章不作提示，其余各章均有明确的分章标注，如第二章就用‘其二’，第三章

就用‘其三’，第四章就用‘其四’。”从《诗经》学史的角度看，“章”的概念出现已久。先秦文献如《左传》等载卿士大夫外交赋诗，即多称引某诗之某章。然而作为《诗经》文本的章题制度，长期以来，只能追溯到东汉末年的熹平石经。阜阳汉简《诗经》及安大简《诗经》均无章题。近年海昏侯简《诗经》的出土，表明西汉中期已有此制，即于章末书以“其几”，标示分章及该章所在位次。基于海昏侯简，人们一度认为，章题的出现是汉代以来经学建构的结果，并非早期形态。荆州王家嘴筒《诗经》书有章末尾题，明记章次，则从文献学的角度将章题制度上推到战国时期。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《诗经》学意义。它表明，确定的章次及其解说，应是早期《诗经》传授的基本内容。

上述传授制度，传世及出土文献皆有线索可寻。《左传》昭公元年晋乐王鲋《小旻》之卒章善矣，吾从之，昭公四年鲁申丰《七月》之卒章，藏冰之道也，及前《孔疏》所引定公十年邱师师赤《臣之业》，在《扬之水》卒章之四言，皆称说章义。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谓《关雎》“其四章则喻矣”，“《大田》之卒章，知言而有礼”，论说特定章次的章义。凡此皆为前述《诗经》学传授方式的承接与反映。虞万里先生根据《左传》等传世文献所载，“上推西周周国学教授《诗》时也已用‘章’”(《章句起源与初期形态蠡测——以安大简、阜阳简、海昏侯简〈诗经〉为中心》)。从《孔子诗论》的称述章旨及王家嘴筒《诗经》的章题制度来看，这一论断应是可信的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按虞先生的观点，《诗经》的分章解说是源于西周周官之学的教授传统，那么，确定的章次次序也应该是必须的。否则，赋诗活动中所谓“首章”“卒章”“二章”“三章”云云则失去意义。部分诗篇章次异次现象的存在，似不足以说明原本章次的确定，我们曾从训诂入手并结合《诗经》书写体例试作讨论(《安大简〈殷其雷〉篇的章次类型与〈诗经〉的叙事逻辑》)。对此问题应做更进一步的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。

总之，荆州王家嘴筒《诗经》提示人们，早期《诗经》的文本传承呈现出相当的规范性，其文本内容具有相当的稳定性。安大简《诗经》诸篇除字形差异外，其具体内容基本同于传世本。《七月》是《诗经》中有数的长篇之一，凡八章章十一句，三百八十三字。阜阳汉简《诗经》所记《七月》字数，与之完全相同。长期以来，人们习惯于用诸子类文献的文本流变推演《诗经》等经典文献的成书规律，过于强调汉代学术对《诗经》经典地位的建构作用，是值得反思的。

文史争鸣



关于纪南城始为楚国都城时间的探讨

——与人文纪录片《楚国八百年》的一点商榷

□ 余大中

由中央电视台、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，央视纪录频道与湖北卫视联合摄制，张晓敏执导的人文纪录片《楚国八百年》，以八集篇幅为载体，将历史深度与艺术感染力巧妙交融，全方位呈现了楚国在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经济等领域的兴衰历程，深刻诠释了楚文化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深远意义，堪称历史人文纪录片中的上乘之作。然而，笔者在观影过程中注意到，片中部分内容在史实表述方面或存可探讨之处，现将其中一例展开分析，以期与学界同仁共同商榷。

在《楚国八百年》第六集《劫难》中，纪录片描述伍子胥率三万吴军精锐奇袭楚国，势如破竹攻入郢都，楚国全民皆兵、竭力死战，致使吴人反抗声中落空。纪录片同时提到，吴国因“只知道、不知道”而酿成惨剧，楚国则在惊涛骇浪中逃过灭顶之灾，“迁都纪南城”。片中一段解说词与字幕称：“后来，楚人在今天的江陵一带建起了一个新的都城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纪南城。在楚国，凡是具有王宫的地方，都被称为郢，冠以地名，以此识别，因为这些都城位于郢地，所以叫做郢都。”出于习惯，楚人仍然简称这个新的都城为郢都。”上述表述暗含两点关键信息：其一，此前楚国都城“郢都”并非纪南城；其二，纪南城是楚昭王迁都后才作为楚国都城，并被命名为“郢都”。

这一叙述与主流文献记载存在显著差异，以下试举数例辨析。荆州官方史料显示：公元前689年，楚文王熊贲将楚都迁至郢(今纪南故城)。楚国存续八百余年，其中定都于郢长达411年，历经21代楚王。早期文献记载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载：“五十一年，昭王即位，数立楚为王。楚怒，以随背己，伐随。武王卒师中而兵罢。于文王熊贲立，始都郢。”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亦载：“文王熊贲立，始都郢。”两则记载虽未明确“郢都”是否为纪南城，但后续文献可佐证二者关联：成书于东汉(公元54年—92年)的《后汉书·地理志》“江陵注”明确指出：“故楚郢都，楚文王自丹阳徙此。”说明郢都位于江陵。

北魏郦道元所著《水经注·卷二十八·沔水二》详细记载：“江陵西北有纪南城，楚文王自丹阳徙此，平王城之。班固言：楚之郢都也。”文中进一步描述纪南城周边地理风貌，如“子胥洪，盖吴师入郢所开也”，直接将纪南城与“郢都”关联。

魏晋时期，杜预镇守荆州时曾考证证明：楚国“国都于郢，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是。”唐代《括地志》亦引用此说，并明确纪南城“在江陵县北十五里”。

据上述文献记载，纪南城作为楚国都城的起始时间可追溯至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都，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，其作为楚都的时长为411年。而纪录片所述“楚昭王迁都纪南城”的时间为公元前506年，较文献记载晚183年。这一差异亟需结合史料进一步考证澄清，以确保楚国历史叙事的准确性与严谨性。



《楚国八百年》纪录片截屏。

活化楚都大家谈

方寸之间见楚魂 以邮票为媒，助推荆州文旅高质量发展

□ 张卫平

一枚邮票能承载多少文化份量?《楚辞》特种邮票的发行，给出了一个令人惊艳的答案。当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跃然方寸之间，当“后皇嘉树”的橘香透过雕版线条氤氲开来时，这场文化盛宴恰似一把钥匙，为打开楚文化宝库、激活荆州文旅产业提供了新的思路。

邮票被称为“国家名片”，此次《楚辞》邮票在荆州首发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。这不仅是对屈原这位文化巨匠、荆州名人的致敬，更是对荆州作为楚文化发祥地的再确认。

此前，荆州最具楚文化标识的出土文物——虎座鸟架鼓早已随着邮票飘扬过海。

而这次的《楚辞》邮票，从《离骚》的执着求索，到《国殇》的壮烈豪情……六枚邮票，犹如六扇时空之窗，将楚文化中最为璀璨的精神符号凝练呈现，达到了“通过国家名片宣传荆州”的目的，从而揭示了文化传播需要载体的真谛。

当《楚辞》经典搭载邮票这一大众收

藏媒介时，其传播半径将突破学术圈层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套邮票的创新表达方式。胶印与双色雕刻工艺的融合，工笔与写意的碰撞，特别是AR数字技术的加持，让古老文本焕发出现代活力。这种“传统内核+现代表达”的模式，正是荆州文旅产业亟待突破的破题之道。

回顾近些年来荆州在楚文化挖掘上的探索，无论是楚文化节节的惊艳展现，还是古城墙光影秀用科技重构历史时空；不管是方特与荆街沉浸式演绎让文物“开口说话”，还是楚绣、楚漆的研学游让非遗“可触可感”，这些实践与邮票创新的思路异曲同工，都指向“活化楚都”的共同命题。

不过，邮票发行的意义不应止步于文化传播层面。从文旅产业视角看，这实质是打造“城市超级IP”的重要契机。

荆州可以此为为契机，构建“三位一体”发展体系：

开发邮票衍生品生态，推出限量邮折、

AR明信片等文创产品，在邮局设立楚文化主题体验馆；

策划“跟着邮票游荆州”主题线路，将明月公园、荆州博物馆、楚故都纪南城、楚车马阵等景点串联成珠；

举办国际楚文化集邮展，吸引海内外收藏家形成文化消费集群。正如苏州凭借“园林邮票”提升国际知名度，荆州也需要利用这样的“文化自信”走向更加广阔舞台。

站在建设荆楚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的历史节点，《楚辞》邮票的发行恰逢其时。文化自信需要具象载体，文旅融合贵在创新表达。当方寸邮票与千年古城相遇，当离骚绝唱与现代科技相融，荆州正以“楚文化权威阐释地”的姿态，书写着“诗与远方”的新篇章。

我们期待，在荆州这片孕育了《楚辞》的热土上，继续以楚人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，精心打造楚都文化旅游目的地，让历史文化遗产真正成为驱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。

三国故事⑬

系马山

□ 邓和平

系马山，位于松滋杨家场镇杨家溶村境内，长200米、面积约100亩、海拔155米。在山岭之上，有无数的凸岩。传说是三国时关云长战马搁鞍所用，取名“马鞍石”；山坡上，有巨石横亘，有大岩斜生，民间流传是马息之地，人们叫这些凸石为“拴马石”；山下，有堰塘数口，当地人讲，三国以前，此处无塘，是关云长来此训练兵马时，起土所筑，供马饮水，俗有“马水堰”之称。

民间传说，关云长在“水淹七军”战役

前夕，在系马山一带日夜操练兵马，分设十二个“跑马岗”。他骑着“日行千里、夜跑八百”的赤兔马，站在系马山顶，检阅队伍，号令三军，带着周仓、关平两员虎将，七十四天未下山头。据说，他为了所统领的军队强盛，十二个“跑马岗”上的兵马实行“奔跑换岗”，以便磨练军士意志，淘汰劣马。当时，有一名小校在“换岗”训练中，因精神不振，未按时到岗，当即传到帐前，询问原委，得知是母患重病，伤心所致。关云长对他罚杖三十，赏银一百两，

并说：“打你三十大板，是因军纪不严，沙场拼搏，容不得你心有二用，如此拖拉，必将坐失良机，为使三军不受影响，故罚；送你雪花银一百两，是因你千里之外，挂念老母，孝心感人，给你回乡养母。”说完，打发小校起程。关云长有赏有罚地处理小校，使三军震动，校场练兵再不敢有落伍的现象。后来，关云长败走麦城遇害，消息传到小校的家乡，小校为感关云长赏银之恩，在系马山附近修“关帝庙”一座，并出家为僧，僧老而终。

文化荆州

二〇二五年第二十八期 总第一百六十期

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

翰墨荆楚⑳



峭峰叠翠白云悠幽。(作者 李小白)